



中古时期的中药文化



图片来源网络

9世纪早期,刘禹锡在中国西南为官时生病了,身体滚烫,如同被火烧灼,这是血气不通的症状。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去看当地的一名医生,后者给他开了药,又告诫他说:“然中有毒,须其疾瘳而止,过当则伤和,是以微其齐也。”药九起效了:十天刘禹锡的所有不适消失,一个月不到他就痊愈了。刘禹锡很高兴,不顾医生的警告继续服药,希望能进一步增强活力,但是五天后,一种异样的麻木感传遍全身。他意识到自己犯错了,于是立即跑去找那位医生。后者当然训斥了他,然后又给他了解药。

刘禹锡在一篇题为“鉴药”的短文中记述了这一事件。以文学才华而闻名的刘禹锡,就像唐朝的许多文人一样,对医药的兴趣也非常浓厚,收集了很多有用的药方和他圈子里的人分享,传播治病疗疾的知识。在这个故事中,刘禹锡揭示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几个关键问题:病者的自身经历、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医患之间的信任,但这个故事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医生开了一种有毒的药来治疗刘禹锡的疾病。毒药怎么能治病呢?如果能,那么到底什么才是药?

7世纪的名医孙思邈认为:“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换言之,药物与非药物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只要运用得当,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成为药物。事实上,传统中药种类繁多,包括草木类、矿物类、动物类和食物类药物。例如,16世纪著名的药理学专著《本草纲目》记载药物近1900种,其中包含千奇百怪的物质。因此,传统中药学的核心是透过治疗的镜头探索整个物质世界。中国传统药学的目的不仅仅是治病,“无毒”药

物中的许多物质还有延年益寿之效。除了关注疾病的治疗,中药学还以提升身体状态、长生为目标,这种对生命提升的追求涉及净化身体,清除体内的有害物质,使之可以跃升到诸种更高阶的生存状态。而身体达到的高度与寿命相关:身体跃升得越高,寿命越长。不出所料,此理念的终极目标是不死。因此,中国传统医学是通过两个相关却又不同的努力方向的相互作用而发展起来的:一为抗击疾病,一为增加身体的活力。

用于第二个目标的大多数药物药性温和,因此可以长期服用,以增强体质。虽然药物治疗可以追根溯源至汉代,《神农本草经》和马王堆出土医书印证了这一点,但其主体框架则成形于随后的数百年。

在这几百年中,药学迅速发展,药知识传播于社会,尤其是对有毒药物的认识加深了。其间有两个分水岭成为有毒药治疗的转变节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分水岭在5世纪。其时医家和药书编撰者以古代典籍为基础,指明每一种药物的毒性,指导人们如何炮制和使用药物,由此开始将药物知识系统化。在此时期,医药行业的专业化程度也有所提高,采药、制药、售药、开药各有不同人等各司其职。第二个分水岭在7世纪。其时隋唐政府积极创办新的医学机构,编撰权威文本,以规范毒药的使用并使医学知识标准化。

7世纪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医家之一——“药王”孙思邈。他把国家编写的药物知识吸收到个人的著述中,并通过书写个人经验来显示其药方的疗效。

(据《以毒为药》光启书局2024年出版)

“尚方宝剑”始于宋

其实,“尚方宝剑”与古人佩剑的传统息息相关。“剑,古之圣品也,始源于殷商之前,至尊至贵,人神咸崇。”先秦时期,剑是身份的象征。宋代李昉等编撰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兵部·卷七十五》引《贾子》云:“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不带剑。”春秋时期,“蛮夷之地”楚国无视周天子法令,平民可任意佩剑。故而,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在《九歌·国殇》中渴望:“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而“尚方宝剑”的来历则与一个机构相关。从战国时期开始,“尚方”是管理最高统治者及亲属御用刀剑等器物的机构。东汉著名宦官、发明家蔡伦就做过“尚方令”,《后汉书·列传·宦者列传》曰:“及和帝即位,转中常侍……后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蔡伦曾言:“御用之器,臣庶不得私用。”既然是最高统治者的佩剑,日常归“尚方署”管理和维护,因而被汉代人称“尚方新马

(据《今晚报》)

慕贞女中

中国儿科医学事业奠基人之一胡亚美、多次为毛主席等领导人担任翻译的齐宗华、五四时期著名作家庐隐……这些光芒四射的女性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烙印,那就是慕贞校友。

1872年,两位美国女教士班美瑞(Maria Brown)和博慕贞(Mary Porter)来到北京,创办了一所专收女孩子的小型学校。学校坐落在崇文门孝顺胡同,先由班美瑞担任校长。一年后,班美瑞因结婚脱离校务,博慕贞接任校长,时间长达10年。由于她在任期间使学校不断壮大,学生增加到100多人,继任者将学校定名为慕贞书院。到了1918年,学校发展为学制完整的中学,便被称为慕贞女子中学,另附设小学。

建校早期,晚清社会依然流行“女子无才便是德”,慕贞招生并不容易。为吸引生源,学校不得不抛出优厚条件,比如免学费、免书本费,提供食宿和衣服,发放回家的路费。物质条件的“诱惑”下,报名的学生多为贫寒家庭的女儿,甚至是孤儿、乞丐。那时,学生中途辍学的司空见惯,读到毕业的寥寥无几,甚至有人领取了新衣服之后就悄悄离开学校。据校刊记载,直到1903年,学校才有人正式毕业;清朝灭亡之前,毕业生数量最多的一年也只有7人(1905年)。

缺钱,一度困扰着慕贞的校长们。办学早期,校舍只有平房三间,学生的膳食也很粗劣。1908年,庐隐在慕贞就读,给母亲写信诉说学校生活清贫苦楚,每天的伙食都是“难以下咽的老窝头、老米饭和唯一的咸菜”。

从简陋的学校升级为京城名校,与慕贞广开财源密切相关。1900年,旧校舍在庚子事变中灰飞烟灭,还是借部分庚子赔款,才盖了新楼房。进入民国后,学校开始向学生收费,而且费用不菲,逐渐转化为贵族学校。20世纪30年代,每生每年所缴纳的费用达119元或99元(膳费可选甲、乙两个档次),此外还有杂费。此时的学生,要么来自富商之家,要么来自军政官员之家,平民出身者屈指可数。

慕贞的校规校纪以“严”字当头。在校生每天六点半起床,不得拖延,上课前把宿舍收拾整齐,力求清洁;七点五十早会,然后上课,下午五点放学,在此期间除了午休,概不准进宿舍;晚上自习,九点熄灯就寝。平日严禁出校,只有每周六下午可以出去走走。学校的考试种类繁多,学业考试分为平时考试、月考、学期考试、毕业考试、补考、特考等。如果成绩长期不佳,还会被勒令退学。

“严”字当头的校园生活中,也有温馨的记忆。很多慕贞学子都提到过校长郑乃清独创的“姐妹节”。新学期开学第一天,每位初一新生都要与一位高中生“相认”,结为一对姐妹。“相认”以后,“姐姐”要从辅导功课到照顾生活,对自己的“妹妹”尽责。这个小节日成为慕贞的传统。据说,有的小姐妹自此结下几十年的友谊。

1925年后,慕贞由中国人主持校务,中国籍教师也逐渐增多。女孩们除学习国文、英语、数学、体育、图画、手工、音乐之外,同样关心时局。1933年3月14日,慕贞组织全校师生赴刺卫生色,两个日夜做成3万余个,送给长城抗战前线的将士;师生还利用休息休息时间缝制棉被和褂裤,送给北平的伤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慕贞一度被日本人控制。日军强迫学生学日语,但学生进行“软”抵制,全都敷衍了事,考试三心二意,校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及格风潮。面对一沓不及格的日语试卷,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日语翻译官洪达没有责怪,反而关上教室门窗,给学生们唱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1952年,慕贞女中由私立学校变为公办学校,改名为北京市第十三女子中学。1968年实行男女合校,1972年更名为北京市第一二五中学,并延续至今。

(据《北京日报》)



市人大代表、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美和 打造“共赢链” 带动产业能级跃升

株洲晚报融媒体中心/王娜

产业是经济之本和发展之基。产业能级提升的关键在何处?在市人大代表、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美和看来,必须加快布局生态链,发挥各产业链上企业的资源优势,建设协同发展的“共赢链”,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

“在生态链中寻找机会,加快应用性技术研发,通过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推动企业发展,助力株洲产业迈上价值链中高端。”袁美和以硬质合金产业为例说,作为株洲的优势产业,近年来,该产业的装备、工艺技术水平达到世界先进,但限于产业现阶段生态,通用产品市场开始“内卷”,规模上不去,导致产业协同作用有限。

市政协委员、株洲日报社经济新闻部副主任高晓燕 做好“情绪”文章 点亮工业旅游经济

株洲晚报融媒体中心/刘芳

在多城卷入文旅产业的当下,株洲正大力推进工业旅游高质量发展,打造“知名旅游目的地”。

市政协委员、株洲日报社经济新闻部副主任高晓燕认为,大力发展工业旅游,既是为了打造旅游新增长点,也是为了让城市更具活力、更有后劲,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株洲,为城市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株洲要凸显自身特色形成错位竞争,以工业旅游发展进一步推动制造名城高质量发展。

随着情绪消费逐渐升温,文旅体验也在发生变化。“首先要做好‘情绪’文章,点亮工业旅游经济。”高晓燕建议,针对不同群体,要精心设计旅游路线,比如面向青年群体,设计“激情之旅”线路,看一场热血沸腾的球赛、体验一圈极限速度的赛车驾驶、享一场绚丽灿烂的烟火、捡一回随心所欲的美瓷;面向青少年群体设计“探索之旅”,则重点打造研学游;面向中老年群体设计“快乐宜居”之旅等等。同时,还可抢占工业风旅拍风口,打造工业旅拍名片。

其次,株洲优势工业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相对远离消费者

市人大代表、茶陵县新月书店总经理谭桂艳 加快“人工智能+教育” 示范应用基地建设

株洲晚报融媒体中心/王娜

当下,人工智能(AI)技术为各行各业带来了变革性的影响,也对培养创新型人才提出新要求。市人大代表、茶陵县新月书店总经理谭桂艳建议,加快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示范应用基地建设,构建以人为本的创新教育生态。

谭桂艳说,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创造了众多职业机遇与创业风口。由此,北京、上海多中小学纷纷建设“人工智能+教育”示范应用基地,以适应新时代要求。听起来门槛较高的人工智能,如何形成“人人皆学”的氛围?谭桂艳建议,要聚焦学情诊断分析、家校社协同育人、学生身心健康、综合素质评价等关键业务,形成一批教育垂直领域的

市政协委员、湖南原力视觉文化传媒董事长郭自元 加快打造清水塘艺术科技设计产业园

株洲晚报融媒体中心/李军

株洲工业文化底蕴深厚,科技创新成果众多。市政协委员、湖南原力视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郭自元认为,株洲亟需促进艺术与科技融合,依托鲁晓波美术馆打造清水塘艺术科技设计产业园,形成独具特色的创新人才培养高地与艺术空间。

在郭自元看来,株洲像一个文艺的理工男,既创造了中国工业史上的诸多第一,又素有“音乐之城”“歌剧绿洲”等美誉。近年来,株洲推出“厂BA”“文艺巷”“街头艺术站”等全新文化品牌,助推制造名城持续“出圈”。

科技“硬实力”如何更好插上文化“软实力”的翅膀?郭自元

“真正的产业链,不是集聚在某个环节,而是要围绕产业的生态链去布局,从而形成‘共赢链’。”袁美和建议,对于传统产业、优势产业而言,政府部门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快促进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耦合匹配、精准对接,同时围绕产业链拓展裂变,培育新动能,挖掘新赛道。

同时,袁美和建议,行业企业也要向外融合、深度链接,在国家战略、产业跃升过程中寻找新机会、“破冰”蓝海市场;标杆企业要聚焦主业做强做大,抓住创新这个关键变量,做优产品和服务,推动整个产业能级跃升。

“我相信,在政府、企业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株洲制造业一定会迈向更高的台阶。”袁美和说。

生活的工业区,趣味性、互动性、体验感不强。高晓燕建议,要创新表达形式,通过不断丰富旅游业态与消费场景,将株洲故事活化展现,增强产品吸引力。

她认为,有两种可借鉴的模式,一是概念延伸丰富体验感,天津长芦汉沽盐场,将制盐工业与野生动物保护概念相融,将盐场打造成青少年亲近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普教育基地,注入了文化新体验。其二,文化演艺增强互动感。今年黄金周期间,宋城演艺旗下全国十大千古情景区7天共计接待游客超260万人次,同比增长59.7%。

此外,还要开拓推广渠道,创新工业旅游资源推广模式。随着国家政策的松绑,游戏IP带来的推广效应不可小觑,今年《黑神话·悟空》游戏爆火后,直接带动山西文旅破圈。目前,株洲清水塘工业区已有游戏公司前来取景,如果能在前期跟游戏公司做好资源推介,或以小投入获得游戏成功后的大回报。此外,围绕游戏而来的周边、二创等产品,也是株洲陶瓷、服饰等轻工领域可快速切入的赛道。

专用大模型,衍生更多典型应用场景,加快布局具有时代特征、株洲特色、教育特点的人工智能创新应用,支撑创新人才培养。

在谭桂艳看来,这种模式不仅分阶段为学生量身定制学习内容,还能促进教师不断完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探索人工智能与学科的深度融合,助力广大学子积极拥抱科技变革。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充分考虑了人工智能技术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影响,确保技术应用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谭桂艳说,在建设过程中,学校应当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遵循基本的教育教学规律以及学生身心成长规律,同时还需重视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问题,营造健康有序的应用氛围。

建议,抢抓鲁晓波美术馆落户契机,在清水塘片区打造科技与艺术“双向奔赴”的平台,助推写好清水塘发展的“后半篇文章”。

郭自元提到,当下清水塘片区在新能源·装备产业新城全新定位下阔步前行,建议我市组建推进清水塘转型发展工作专班,高位推动、统筹协调,进一步争取中央和省里的支持,强化省市工作联动,各条战线协调配合,推进各项工作开展。郭自元建议加速推进鲁晓波美术馆建设,延伸打造美术、音乐与科技交叉融合的系列场馆,探索艺产融合、艺商融合、艺城融合新模式。



市人大代表袁美和 记者/张媛 摄



市政协委员高晓燕 记者/刘震 摄



市人大代表谭桂艳 记者/徐健浩 摄



市政协委员郭自元 记者/谢慧 摄